

历年春晚,因为众口难调,总被人议论,其中一定有喝彩,有批评,有质疑,还有胡搞。今年也不例外。一以贯之的是,那些议论,总是无不反映了人们的处世心态和价值取向。检点两条,颇堪玩味。

春晚之后,本来木知木觉的观众,突然被一条新闻提醒。据中国新闻网2月3日报道,“美国时间2月1日晚,中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来到美国纽约著名的艺术殿堂——林肯中心参演纽约爱乐乐团第三届中国新年音乐会,在中美两地引发不少关注。”原来如此,怪不得春晚上不见宋祖英。文章说,在接受记者提问时,宋祖英坦诚回应了未上央视春晚的缘由,“主要还是与纽约这场音乐会‘时间冲突’,特别是需要提前与纽约爱乐乐团进行排练磨合。



边看边聊

经过考虑还是选择来到纽约,选择了不同的舞台……”不知道这是一次随机还是特别安排的

谈起“春运”,我们这些曾经在外地工作的插兄插妹最有体会。那时对春运远没有现在那么重视,火车票晚点是家常便饭,能坐上火车就是大幸特幸,何时到家没有个定数。那时没有预售票,也没有座位票、站票之分,反正是到了火车站总能买到,上得了车上不了车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在江西曾经工作27年,我们上车的车站是福建的光泽站,不是始发站,都是路过车。每年回家探亲的历程真可谓曲折婉转、有惊无险。

1979年春节是以“过革命化春节”为名多年后第一次重新过传统意义上的春节,全国掀起了回家探亲的高潮。我当时在一个乡镇工作,越是到年终

也是考试

前两天,我经历了一场“考试”,成绩刚刚及格。那天上午11点,我从新村图书馆出来,回家做饭。岔路口,一个红领巾走上来,老爷爷,我要到呼兰路845路公交站,您能带我去吗?我说:“不远。一直走,前面是所小学,再朝右拐,出大门就到。”他说:“我的视力差,看不清三米以外的东西。”我看他眼睛很明亮,也未戴眼镜,就说:“学校旁边有个皮鞋摊,你问他就行。他说,那好吧。

分手没几米,想想不对。北大门是小区车辆唯一的进口,大小车辆川流不息。孩子视力差,不是太安全。连忙折回,追上几步。对他,还是我带你去吧。他谢谢爷爷。我将他领到车站,而他并不上车,突然对我说:“老爷爷,请原谅,我对您说了谎。我的眼睛是好的,也不去乘公交车。”

我愣住了:那你要做什么?他说:“我在做个简单的调查。听说外国人都肯为行人指路,并常常将问路人送到目的地。我就想随机访问100位老人。因为老人时间较充裕。刚才我问过五位老人,两位不睬我,两位手指路,只有您送我到车站。您是一个好爷爷。”我说,这场“考试”我也是刚及格。先前我不是也没有送你吗?他又说:“爷爷,你要为我保密。”“为什么?这事没有什么不好。你们学校不知道吗?”“老师说,你不要做潮童了,还是好好温习功课。”我说,我保证。

采访,总之,在春晚这个节骨眼上,我对此感到别扭。一个已经连续24年出现在春晚的“老面孔”,偶而缺席了一次春晚,媒体或歌唱家本人竟然

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,演员在舞台上的兴衰浮沉、新陈代谢,此起彼伏,将是大概率的事情,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我们已经适应或正在适应公众人物悄无声

写在春晚边上的边上

西坡

要向全国人民“安民告示”,这里头折射出怎样的心态?

我注意到宋祖英用了“选择”这个词,显然是想告诉观众:我并没有被春晚“拿下”,如果不是因为档期冲突,还得上春晚。

作这样的表示其实大可不必。

不错,国人向以出席率、见报率、上镜率来判断公众人物的“趋势”“行程”的“风向标”,这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习惯。但这种不太好的习惯之所以养成,根本原因却是受到媒体影响(也许媒体也是受到了有关方面的“关照”)。事实上,在倡导文化多元融合的今天,

越是忙。儿子满11个月,刚刚断奶。爱人因为是教师放假比较早,公婆年事已高,他先行回家帮父母料理春节前家务。我一直

我的一次春运经历

柏万青

忙到小年夜才放假。因要带孩子回家,路上的正常行程要16个小时。上车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。调好两瓶奶糕,备好奶粉,与玩具一起放在一个军用小背包内。晚上同事把车打开,下面的同事把我托起推进窗内,怎奈背上有

个背包,怎么也进不去,我就把背包拿下,顺手递给下面的人,自己终于“趴”进去了,然后把儿子抱进来,这时我想起装有儿子玩具和一路“粮食”那个军用小背包,便让下面的同事递上来,但下面的同事都说没有看见,估计是我放下时被陌生人拿走,他以为包内一定有值钱的东西,竟开溜了。这下急死我了,这一路上十多个小时,大人还熬得过去,孩子吃什么?我着急得“哇”地嚎啕大哭,下面的同事也无可奈何,因为列车马上就要开,就到附近商店买点食品也来不及了,只得含泪告别同事们。

车厢拥挤的程度,用水泄不通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我只能一只脚踏地,另一只脚搁在别人的行李上,又闷又热,儿子一下子不习惯,拼命地哭,怎么哄都哄不住。我又急又恨与儿子哭成一团。列车上的乘客得知我的遭遇纷纷安慰我,有的拿出馒头,有的递来爆米花糖。有东西吃了,儿子慢慢静下来。只过了一站,就有一位靠窗坐的解放军下车,把位子留给了我,一旁等候多站的乘客没有一个有异议,我“心安理得”地坐上了靠窗的位子。我带了一壶开水,乘客送给我那些吃的成了儿子一路上的“食粮”。好在儿子不挑食。一路上吃饱了就睡,睡醒了就玩。儿子见人爱,又不怕生,大家轮流抱抱,逗逗乐。

火车每站都有乘客“吊车”,所以站站延时,16个小时的行程走了24小时,足足晚点8个小时。一壶水到第二天就没了,孩子

在巴西首府里约热内卢,一些负责收集可回收性垃圾的人仍在使用马车。许多马到死都在劳动,但它们却没能像其他家畜那样过上好日子。这种现象引起了市民特别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同情,他们希望这种情况能得到改变。

根据市民们的建议,里约热内卢市政府最近批准了一项新法律,该法律赋予了在里约热内卢工作的马和其他动物多项劳动权益,其中包括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为8小时,每周有一天休息日;如果

为马立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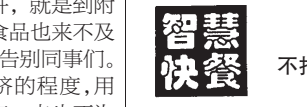
瑞良

母马怀孕,将享有数天的产假。按照法律规定,垃圾车将被安装上标牌,而拉车的马将被打上标有其注册号码的文书。该法律还规定,驾车人不得使用鞭子抽打马,虐待牲畜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和制裁。

起草此项法律的市议会议员科瓦尔坎蒂说:“我们正在考虑对该法规进行一些修改,包括增加允许马在工作多年,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退休的条款。此举希望使马在辛勤工作一辈子后,能安度晚年。”

子没水喝,又开始烦躁。乘客们就用我的小茶缸一次次地递水,看着那只盛满水的小茶缸从车厢东面一路递来,真是一道温馨的风景区。尽管大家都需要水,但知道是给孩子喝的,没有一个人“私吞”。由于车厢拥挤,根本没有办法上厕所,眼看火车过了杭州,上海快到了,小家伙一泡屎拉在我的身上,我很内疚地向周围乘客道歉,这些乘客没有责怪、没有嫌弃,帮我把外套全部脱下。我们母子在车厢热心的乘客们帮助下,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旅途。等到火车驶进上海站,我丈夫

和儿子的三舅已经等候了8个小时,那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,只能在焦急中等待。想起这次艰难的旅程,打心里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热心乘客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逸 不拍马屁拍马头,头脑清醒不失蹄。

今年春晚关注者尤夥,多半由于主其事者乃是以贺岁片成名的电影界名导演。其实,电影导演入主“春晚”之前,我们甚至有过一部“春晚”电影,那就是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《春节大联欢》,这一年,电视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(作为央视前身的“北京电视台”正式建立于1958年)。这部影片接近80分钟,由张骏祥先生担任总导演,导演团队中还有林农、谢晋、岑范和王映东四位;那时候没有“主持人”这个说法,而统一称作“报告员”,任男报告员的是郭振清,《平原游击队》(1955年)中李向阳的扮演者,女报告员为安琪;担任现场舞台监督的则是谢添。

这台春节联欢会上表演的均属一时之选,赵丹、白杨、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王文娟、徐玉兰、侯宝林、周小燕、郭兰英等,而观众也是来自各界的知名人士,老舍、巴金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赵忠尧,甚至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也在席间露面……据说,这部影片公映之前,它的录音版本首先在1956年2月11日,也就是除夕当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各地播出。在大众传播的这个意义上,这部《春节大联欢》还真是央视春晚的先导。

不算春晚的拥趸,每年这个时候我还是会开着电视,做点闲事,一面有一搭没一搭轮换搜索下各频道的节目。今年,吸引我的是一套刚到手的新书,《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》,厚厚的十大册。最先取出

是,冯小刚的春晚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节目,把“农民工”、“雾霾和污染”以及“房价和城里的蜗居族”这三个民生问题表现出来?

平心而论,冯小刚在春晚“泛政治化”方面,尺度控制得相当合适。这是导演的努力,也可以说是审查者较过去变得开明了。春晚不是开“人大”,必须考量紧迫的民生问题,作出部署,郑重发布。如果没有很高的水平来演绎,我以为宁缺毋滥才是高明的做法。退一步说,春晚即使不涉及这些那些的民生问题又怎样?春晚变成新闻联播的娱乐版,人民群众就会满意了吗?这是没有的事儿!

把春晚办成给人民上课或访贫问苦的平台,本来就是不明智的,一厢情愿的。春晚是集聚欢乐的场合,哪壶不开提哪壶,不是春晚的原旨。现在有人居然老调重提,不能不让人想到“与时俱进”这句话,说容易,要真正做到,大家真的还得加把劲,其中包括节目审查者和评论家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逸 不拍马屁拍马头,头脑清醒不失蹄。

深夜的海洋与宇宙星空如此相像。当我们向更深处沉潜,感觉就如同往宇宙进发,如同飞往太阳的伊卡鲁斯。

原来当一个理想主义的旅人,这么自由美好。

原来当一个理想主义的旅人,这么自由美好。

新春话影事

汤惟杰

景、水景、园林花木,以及轮船帆船等一切照片,于电光中使之放大,在屏幕上映演之,并不活动。映时幕上须频换以水,否则恐有燃烧之虑。”这一细节提醒我们,“影戏”,甚至“电光影戏”的名号并不就是后来说的电影,也有可能是幻灯放映。

“至光绪末叶,福州路茶寮中,有映活动电光影片者,张四五尺见方之白布幕为之,则人物皆能行动,观者始得未曾有,然亦只捕鱼猎兽,涉水登山,及工场动作,家庭琐屑等事,并无正本长片。且布幕既小,光线不能充足,尤多未能尽美之憾。后有郎姓在中泥城桥西堍(即今新世界饭店旧址——此为原作者注),创开幻仙电光影戏园,将幕放大,剧中景物,无一不显豁呈露,观者始趋之若鹜。”其所描绘上海早期电影放映的若干情节,有和时下影史叙述不尽相同之处,也足资学者参考。除夕夜,至少你可以读上几页好书,如果懒得打开电视的话。

那日在南京禄口机场,我说,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路过这座机场。分别时送给朋友戴尼尔一本二手的英文原版《夜航西飞》。“写点什么,”他要求道,“最好是绝望的句子,我受够了不切实际的温情。”于是我在扉页上用钢笔里最后一滴墨水写下这样的句子:

We fly a little every day. We die a little as well.

我们每天飞远一点,我们每天死掉一些。

戴尼尔看了之后说:“对,时间不多了,不要浪费。”他飞新加坡,然后转机前往南美。我则开车回住处。

如今我已逐字逐句将《夜航西飞》译成中文,且中文译本也再版了精装本。“一个理想主义者,应该听从自己的心。”戴尼尔听说以后这样回答。

那次分别一个月后,戴尼尔发简讯来,离开南美的最后一天,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店梦里梦见我。我问:“你把书读完了?”这么好的梦,可惜我是梦里的人,而非做梦的那个。

当戴尼尔在平安夜登上马丘比丘的时候,我正和当时的老板唇枪舌剑谈工作,他要砍我的预算。看见戴尼尔说终于到达马丘比丘的手机简讯时,想起聂鲁达长诗《马丘比丘之巅》中的句子: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。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……

终于按耐不住,发出一声叹息,合上面前的会议笔记。老板吓到了说:“怎样?不过是预算啊。”我举起手机给他看。

“马丘比丘?印加?!”他说,“你们这些人,就是太理想主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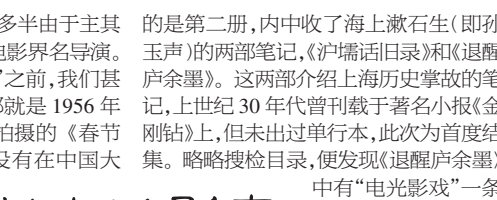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在大约十五世纪的时候,强盛的印加帝国选择在海拔2400米的崇山峻岭之间以巨石建造起这座雄伟的城池,不过是为了离太阳近一点。建造完这样的理想主义城市,留下许多谜语以后,他们就消失了。仿佛那个以一双蜡翅膀飞向太阳的伊卡鲁斯,在最接近的时候坠落。

会议结束我给戴尼尔回简讯,问他:“走那么远,累不累?”他答:“人生这么长的旅程,一走几十年,怕的不是累,是厌倦。”

不久我终于辞去了白领的工作,第一站是南太平洋。跨越季节和赤道,像戴尼尔说的那样,走得越远越好。住在斐济群岛的某个小岛上时,决定尝试一直不够勇气体验的夜潜。教练在码头上检查我的装备,下水前给了我一只手电筒,没有多余的话。夜潜中途下起了暴雨,在水下只听见隐约的啪啪脆响,抬头的时候,在气泡间依旧能看见远处群山间的闪电如坏了的灯泡,明灭不定。教练示意关上手电,我发现四周和我们一起悬浮的是萤火虫一样的浮游生物。一只很少见的粉红色海星从我肩头经过,它有透明柔软的触须。

原来当一个理想主义的旅人,这么自由美好。

原来当一个理想主义的旅人,这么自由美好。



夜光杯

除夕夜,至少你可以读上几页好书,如果懒得打开电视的话。



七夕会 影音方园